〔动态〕

清代乾嘉道时期研究现状综述

陈　　桦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从公元1736年到1850年，共经114年时间，占整个清代267年历史的近二分之一，是清代社会由强盛走向衰弱，从一个独立完整的封建主权国家，变为受外来侵略者欺辱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重要历史时期。辛亥革命后，人们开始对清朝历史的研究，乾嘉道时期也同时受到注意，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研究文论。尤其是近年，更呈迅速发展趋势。然而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乾、嘉、道相对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以及1840年以后近代史研究，则存在明显差距。

从乾、嘉、道研究的现状看，文化思想方面的成绩最为突出。其中乾嘉学派又是最引人注目的课题。继康熙年间崇尚程朱理学之后，乾嘉汉学成为清代社会学术主流。这一学派中产生了诸如惠栋、王鸣盛、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众多的著名学者。他们不仅以严谨刻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通过音韵、训诂、校勘、考据、对中国古籍的整理发掘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哲学上，以注经明古书之义为由，对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展开批判。

作为整体研究，多年来研究者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发展及其社会背景进行了广泛探讨，其间存在着比较大的认识分歧。

在乾嘉学派形成原因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清朝统治者实施的文化专制以及民族高压政策，迫使知识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产生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乾嘉学派。也有学者认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是汉代学者整理文献典籍之风的继续，而清代文网甚密，康乾社会的稳定繁荣则是其直接原因。还有许多学者视乾嘉学派为康乾盛世的产物。因为经过康熙中叶以后数十年的发展，进入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定，满汉民族矛盾缓和，新一代知识分子走上舞台，同时清朝长期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扼杀了清初以来思想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们谨小慎微，不敢接触现实，研究领域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古文献的整理诠释，最终形成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重视实证，拘泥烦琐的考据学。

关于乾嘉学派的发展过程，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将其分成肇始、盛行和没落三个阶段。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启乾嘉学派之先河。乾嘉时期，以惠栋、戴震为代表，学派正式形成。嘉道之际走向衰落。另一种观点，则将清代考据学分为清初、乾嘉、道成和清季四个阶段。

对于乾嘉学派的评价，多数学者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其在古籍整理，小学，以及树立崇事实，贵创见新学风方面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它受时代局限，为封建统治服务，考证问题脱离实际，流于烦琐，思想闭塞，眼光狭窄的弊病。

乾嘉学派的研究中，还应该提到的是关系戴震的研究。作为乾嘉学派的一代宗师，戴震的思想及学术，清代的时候即已有人整理著述。民国初年出现了戴震研究的第一次热潮，梁启超、胡适都发表过有份量的论著。近年，戴震研究又有新的进展，论著数量增多，研究领域扩大，并且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团体——戴震研究会。1986年5月，该研究会在戴震家乡安徽屯溪召开了戴震学术思想讨论会。

除戴震之外，人们对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语言文字和校勘学方面的贡献，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评价。

十八世纪后期，乾嘉学派走向衰落，汉、宋合流，以探索经学“微言大义”，不重名物训诂，援经议政为宗旨的今文经学崛起。十九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与入侵，震动了中国知识界，开始涌现出一批提倡经世致用，匡世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清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变化，引起了现代史学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成为研究的热点。从他们要求改革的思想，到积极抵抗外来侵略的主张，都不乏见解独到的精辟之作，形成乾嘉道文化思想研究的另一特点。但是也应看到，人们对该时期今文经学以及其他先进思想家、学者的注意还是不够的。

谈到乾嘉道时期的文化思想，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四库全书》。这部耗时十年，收书三千五百零三

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类分经、史、子，集，堪称中国最大丛书的编纂，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在宏扬民族文化，保存、整理古籍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其间由于封建文化专制政策所导致的毁书、禁书之举，又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关于《四库全书》的文论也比较多，涉及《全书》的编采、编目、订误、收藏，以及编纂中的禁书、毁书等方面。198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爱平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是一部全面探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与内容的不可多得的专门著作。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档案材料，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秘密结社是清史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而天地会是嘉道时期最重要的秘密结社之一。由于天地会有比较完备的结会仪式、隐语暗号、秘密文件，会员遍及南方闽、粤等七省及海外华侨之中，而且存在时间长，影响直至近现代社会，故受到人们的特殊重视。关于天地会的研究，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前后。当时革命党人出于斗争需要，对天地会历史进行了探讨。从此，天地会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都相继形成过研究高潮，出现一批有质量的论文和专著。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在天地会起源、创立宗旨等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看法。关于天地会起源，有“康熙说”与“乾隆说”之辩，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则有“反清复明”与“互济互助”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1986年，清朝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于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审拟僧行义、陈彪奏折的发现，进一步推动了上述问题的研究。

近年有关天地会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也取得了可喜成果。从197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协力，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文种档案为主，官书记载为辅，搜集整理了大量天地会史料。经过数载努力，将其汇编成书，题名《天地会》，自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共计七册，总计二百四十余万字，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便利条件。

不过，有关天地会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其时整个秘密社会的研究。在天地会之外，嘉道时期仍存在着其它许多秘密结社。这方面，尽管也有文章涉及，但从整体上讲，研究极为薄弱，几乎等于空白，应引起学界重视。

同秘密结社一样，秘密宗教也是清代，特别是乾嘉道时期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社会力量。数以百计的民间教派，分布于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地域之内。发生在乾嘉道时期的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如乾隆三十九年的山东王伦起义，嘉庆元年爆发，历史九年半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的李文成天理教起义，几乎全部是由秘密教派发动领导的。正是民间宗教与阶级斗争紧密结合的特点，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注意。

从五十年代以来，大陆研究者从农民战争的角度入手，对这一时期白莲教的有关教派进行了研究。就其思想内容、教义、组织形式、性质，以及民间宗教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等方面做了探讨，形成一批成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资料室整理出版了五册《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蒋维民先生编辑的《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述研究的成绩是开拓性的，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从农民战争的角度对秘密宗教进行发掘、探讨是远远不够的。秘密宗教及其教派的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宗教史，一部民间宗教史，我们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够搞清它的全貌，明了这种宗教狂热为什么历经统治者长期血腥镇压而不灭，终为千百万群众所接受信仰。近年一些中青年研究者们，开始摆脱旧的研究框架，以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为依据，对民间宗教的源流、教义思想、活动方式与农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对底层社会的影响等进行探索。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应属马西沙先生的《清代八卦教》一书。该书运用丰富的档案材料，以华北地区八卦教这一重要教派为原形，进行了有意偿识，而引起人们的注目。应该说，这种新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而且仅仅局限于黄天教、八卦教等少数教派，但它对今后秘密宗教研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乾嘉道时期的中外关系，尤其是1840年以前的中外关系研究，现在也开始受到人们重视。十八世纪以后，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关系愈益紧张。经过产业革命的世界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到处寻找市场，列强们纷纷踏关而来，企图叩开中国的大门。面对这种情况，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将沿海通商口岸限定

在广州一口，关闭了宁波等三处海关。差不多同时，禁止北路俄国商队来京贸易，限定于恰克图一地贸易，形成南北海陆各设一口通商的体制。尽管如此，中外的经济往来；宗教文化的传播仍在缓慢地发展，甚至还有政治方面的接触。一些研究者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撰文就乾隆年间的恰克图贸易，十八世纪的中英关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等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了可喜成果。上述研究也仅是个开始，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外关系的发展，这种发展所及于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都是有待进一步研讨的课题。

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专朝史研究中，乾隆朝研究近年发展最迅速。乾隆朝是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就大陆学界而言，关于这样一个重要朝代的研究，却起步很晚。八十年代以前，有关的专门著作一部也没有，论文也极少。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康乾盛世的讨论，促进了乾隆朝研究。近几年，这方面成果增多，研究领域也逐渐拓宽。

边疆问题是研究者用力最勤的地方。乾隆朝继承了康熙、雍正加强边疆少数民族统一，巩固多民族国家的政策。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在新疆，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部上层首领叛乱，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平定天山南部大小和卓叛乱；在西藏，乾隆五十五年，平定藏王朱墨尔特叛乱，五十六年，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在四川，乾隆十年平定大金川叛乱，三十一年至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研究者们对这些事件的原因、性质、影响，以及清政府政策等，都做了全面深入探讨。同时还注意到清政府对该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如《钦定西藏章程》的订立施行，天山南北各城将军、参赞大臣的设置，大小金川地区的改土归流，改土归屯，西北地区的大规模屯垦等。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乾隆朝的上述政策与措施、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主义的局限性而存在着许多弊端和问题，但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疆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乾隆朝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则不够深入。政治方面，论者仅涉及到乾隆朝初期政治措施，乾隆南巡，以及乾隆晚期政治，包括和钟擅权，乾隆帝与和珅的关系。经济方面，则集中于粮食问题的研究，内地与新疆的贸易，旗地问题研究。不过应该提到的是，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刑科题本进行了长期的整理研究，撰写了一批关于土地关系、租佃关系、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学术论文，所整理的档案材料，也在八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之下，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封建君主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人们在考察乾隆朝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注意到乾隆皇帝个人。目前这方面研究虽然刚刚开始，但已经非常活跃。研究者们已经不仅仅把乾隆帝作为一个政治性人物，抓住其与当时政治，以及政府各方面政策的关系，而且也将他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性格，有生活的人，把视角移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乾隆帝的诗文，乾隆帝的家庭，乾隆帝的民族语言水平，甚至乾乾的家庙、讳忌别号都成为了研究课题 .新近出版的周远廉先生的《乾隆皇帝大传》，白新良先生的《乾隆传》，都是系统研究乾隆皇帝的专门著作。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台湾学者在乾隆朝研究中成果丰硕，出版了一批有质量的学术著作。如李光涛先生的《记乾隆年平定安南之役》，庄吉发先生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罗运治先生的《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马起华先生的《清高宗朝之弹劾案》，赖福顺先生的《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毕梅雪、侯锦郎二先生合著的《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等等。台湾的学者还将台湾所藏乾隆朝档案进行整理编辑，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作为《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分辑陆续出版发行，惠及整个清史学界。

在乾嘉道三朝中，嘉庆朝的研究是最薄弱的。迄今为止，已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数量极少，而且仅局限于农民战争，主要是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另有一些嘉庆初年政治，主要为惩治和珅问题的文章。人们在撰写通史时，对嘉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都是泛泛而论，譬如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财政危机，军纪废弛等，而缺乏具体实际的内容。嘉庆朝比之于乾隆朝，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社会的动荡不安，秩序的混乱，这其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而这些变化及原因，需要扎实、细致的具体研究，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讲，嘉庆朝仍属清史研究中的空白。

道光朝的研究则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道光朝历经三十载，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同西方世界的关系。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人民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尖锐化。战争的失

败，将中国社会抛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因此也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大陆学者一般将第一次鸦片战争划入近代史研究范畴，围绕着这场战争，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五十年代，中国史学会整理、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种，六册的《鸦片战争》。六十年代，又依据档案，出版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等重要资料。与此同时，对这场战争的起因及社会背景，战争前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与变化，战争的过程、性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等，进行全面探讨。近年以来，人们不但运用中国方面的档案从事研究，而且也开始广泛使用英国外交部档案，硕果累累。

但是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研究，并不能替代整个道光朝的研究，尤其是道光二十年以前历史的研究，然而这段历史恰恰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除前面介绍的文化思想，秘密社会之外，其它方面的研究，只是在漕粮海运，张格尔叛乱等问题上有为数不多的文章。

通过上述我们看到，乾嘉道的研究与顺康雍及晚清史相比较，确实很落后，但是这种研究毕竟已经开始。应指出的是，1990年8月22日至26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了由十六家科研、高校、出版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以“乾嘉道时期的中国社会”为中心议题的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126位中外代表，共提交了74篇学术论文，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中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再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见解。另据了解，一批有意义的选题也在紧张的进行之中。相信不久的将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乾嘉道研究将会迎来自己丰硕的收获季节。

《清史满语辞典》问世

辛　舒

商鸿逵、刘景宪、季永海、徐凯合著的《清史满语辞典》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本书所辑清代史籍中满名汉字音译辞条计1400余条，内容包括衙署、职官、封号、谥号、爵号、部分地名、部族名、人名及其它用语。史籍中常见的汉字音译蒙古族职官名称，亦酌量收录。辞条用罗马字母标出满语音节，后加注国际音标，并断句，释明汉义、汉名。释文内容丰富，旁征博引，标明史料来源。例如，职官、封爵等辞目，主要根据《清实录》、《大清会典》等官修书，叙其职掌、品级、沿革，详其始末。

此书是国内第一部满名汉释的学术性工具书，它的问世将会给清史、清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及爱好者翻阅清代史籍时，解决满名方面的疑难有所帮助。

《清朝文字狱》出版

令狐章

文字狱古已有之，但在中国古代，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当以清朝为最。而清朝文字狱的档案资料又极其丰富，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字狱最有科学研究的可能，也最具科学研究的价值。

由郭成康、林铁钧合著的《清朝文字狱》一书(群众出版社，责任编辑季青)已于近日出版发行，与广大读者见面。该书由“清朝文字狱纵横谈”、“要案始末”和“清朝文字狱大事记”三部分组成，是一部对清代文字狱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

“清朝文字狱纵横谈”勾画了有清一代不同时期的大概轮廓，其中不仅探讨了文字狱与帝王个性之间关系这一历史的偶然因素，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文字狱之所以泛滥，以致酿成一场人间浩劫的某种规律性。作者指出，文字狱是封建专制时代一种带有概然性规律的历史现象，只有当封建帝王既有强化封建专制的强烈需要，又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这样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才有可能造成一场严重的文祸。这对于人们认识文字狱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倾向有一定启发意义。它如：要案始末”等均都反映出了作者研究的新成果。